

中外名人傳

(二十六)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七十二頁)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顧祝同 (一八九一—一九八七)

選拔進入陸軍小學

顧祝同是近代風雲人物之一，在北伐、抗日及剿共戰爭中，屢膺重寄，建有殊勳。尤其在處理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及四川、貴州、雲南等省地方性軍事衝突中，沉穩練達，不戰而屈人之兵，完成軍事思想的最高理想。他所以能夠奏此奇功，實得力於個性忠厚，寬恕待人之故。

顧祝同字墨三，一八九一年十一月廿二日生於江蘇連水，為當地耕讀人家，六歲啟蒙，入私塾讀四書五經，奠定國學初基。一九〇八年轉入縣立高等小學就讀。一九一〇年各高小選拔優秀學生進入江蘇省陸軍小學，顧祝同入選，為第五期生。次年武昌起義，他未畢業即奉派參加革命軍，擔任陸軍第九師第三十四團排長。南北議和後，重回陸

軍小學學習，至一九一三年完成陸小基本教育，是年夏畢業，加入國民黨。二次革命爆發，顧祝同趕往南京，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參謀。九月三日，南京失守，顧祝同脫險走上海。次年春，陸軍部召集江南各省陸軍小學畢業生入湖北第二預備學校深造。一九一七年畢業，再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步科，一九一九年畢業，分發部隊任職，先後擔任長江上游總部第四旅第七團第九連連長、湖南清鄉衛隊營營副，歷時兩年。一九二一年五月，孫文在廣州成立軍政府，顧祝同南下投效，加入預備北伐的粵軍第二軍許崇智部，初任軍士教導隊區隊長，當時軍參謀長為蔣中正，兩入遂告結識，深受重視。不久，第二軍擴編為東路討賊軍，顧祝同升任該軍總部副官長。

一九二二年春天，顧祝同隨軍北伐，進入江西。六月，陳炯明叛變，許崇智部奉命由江西入福建，十月，克福州，許部由閩入粵。一九二四年六月，國民革命軍成立黃埔軍校，蔣中正任校長，顧祝同被派為中校戰術教官兼管理部主任。十一月十一日，孫文下令組建國民革命軍，委蔣中正為軍事秘書，黃埔軍校成立兩個教導隊，顧祝同任第二團第一營營長。

東征北伐身先士卒

一九二五年三月，革命軍第一次東征，顧祝同率第一營討伐叛軍，他貫徹執行「告東江人民書」、「告人民同胞書」、「告百粵父老兄弟姊妹」等文告，軍紀較好，獲人民擁戴。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三日，教導第二團與陳炯明部的葉舉、熊略等部激戰於淡水城下，顧祝同率第一營，攻下淡水城，每個官兵都得到學校的賞銀三十元。接著，他又率全營參加了棉湖之戰，協同主力部隊打敗陳炯明的主力林虎所部三個師。第一次東征結束，顧祝同因戰功升第一師第二團參謀主任。這年四月，孫文主義學會在廣州成立，他立即在軍校參加了該學會。

第二次東征時，顧祝同率第一營參加了攻克惠州之戰。接著會師安流，參加了潮州、梅縣之戰，因戰功擢升第二團團副，不久升任該團團長。一九二五年八月廿六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議，將黃埔黨軍改為第一軍，顧祝同調任第一軍第三師參謀長，旋任副師長，隨同軍長何應欽駐防潮州。

一九二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率軍北伐，何應欽的部隊奉命攻向福建，顧祝同協助第三師師長譚曙卿指揮，於同年九月在福建松口擊潰周蔭人部，接著又擊敗周軍的李寶珩和劉俊部，活捉了李寶珩，重傷劉俊。十月十九日，他又率部激戰一晝夜，攻克永定縣城，光復漳州，十二月二日克福州，積功升第三師師長。一九二七年一月奉命攻向浙江，克杭州，參加淞滬作戰，接著會攻南京，三月二十五日隨總指揮何應欽進入南京城。

一九二七年五月，國民革命軍開始三路北伐，顧祝同的部隊編入第二路，由蔣總司令直接指揮。是年八月，蔣總司令被迫下野，孫傳芳趁機以七萬之眾，渡過長江，分三路攻向南京，在烏龍山、棲霞山、龍潭地區向北伐軍進攻，情況異常緊張。顧祝同奉命率領第三師向龍潭方向反擊，協同其他各師，於二十六日收復龍潭車站，殲敵三萬人，迫使孫傳芳殘部逃往江北，受到上級的表揚。

龍潭戰役後，軍隊實行整編。顧祝同升

任第九軍軍長，下轄第三師（師長涂思宗）、第十四師（師長黃國梁）、第二十一師（師長陳誠）。

同年十二月四日，顧祝同指揮第九軍於十一日向三界發起猛攻，打敗了孫傳芳部的守軍，占領安徽鳳陽。繼後，顧祝同第九軍沿津浦鐵路左翼，劉峙的第一軍沿鐵路正面向北推進。攻占臨淮關後，因敵軍情況不明，何應欽命令部隊向後撤退。顧祝同怕突出吃虧，接到命令後就立即率部退卻。下級官兵對打了勝仗反而退卻感到莫名其妙，師長陳誠也打電話詢問原因。顧祝同解釋說，我們遵照命令行事。這樣，全軍一直退到紅心舖。而劉峙的第一軍因沒有接到撤退命令，繼續前進，結果在長淮衛與孫軍遭遇，一戰而勝，占領了蚌埠。這時，顧祝同部已後撤六十公里，而劉峙軍卻前進約二十公里，一進一退，相形見绌。何應欽本來打算讓顧祝同統一指揮第一、九兩軍，結果改變主意，令劉峙統一指揮兩個軍。顧的第九軍在劉峙的統一指揮下，擊潰張宗昌部的守軍，迭克徐州以西的顏山、良山等堅固陣地，於十六日占領徐州。

一九二八年一月，蔣總司令復職，重整北伐軍的戰鬥序列，繼續北伐，顧祝同的第九軍歸第一集團軍劉峙指揮，擔任攻略濟南的主力。二月初，國民黨舉行四屆二中全會，顧祝同當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四月，他率部攻克台兒莊，五月一日進佔濟南

。五月三日，日軍在濟南製造「五三慘案」，殺害中國軍民，顧祝同奉命「不抵抗」，率部撤出濟南，退到徐州及蚌埠整訓，接著第九軍改編為第一軍第二師，顧祝同改任師長，下轄第四、第五、第六旅。

討桂討馮出戰有功

一九二九年三月，桂系李宗仁在湖北、湖南等地異動，顧祝同率第二師參加討桂戰爭，向武漢進擊，他由蚌埠出發，經皖西、鄂西，桂系抵抗輕微，他兵不血刃即抵達武漢，旋代魯滌平出任武漢衛戍司令。是年冬，又參加了討伐唐生智、石友三的作戰。

一九三〇年春，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組成反蔣聯合陣線。以七十萬大軍南北並進，四月八日，顧祝同參加了中央在徐州召開的軍事會議，奉命率部在劉峙的指揮下，沿隴海鐵路由東向西攻擊。他分析馮玉祥派守歸德的萬選才部的萬殿尊、石振青兩師，素質較差，戰力不強，戒備不嚴，宜利用己方火力的優勢，採用突擊行動，於五月十一日發起猛烈攻擊。一舉奪占歸德，迫使萬、石兩部投降，並乘機急進，再克蘭封。

此時，西北軍反攻，攻勢凌厲，顧祝同所部第一師師長徐庭瑤負傷，被迫採取守勢。顧祝同的指揮部設在內黃，他沉着應付，屹立不動，並伺機前進，逐步恢復原佔陣線，隨後兩軍進行拉鋸戰。九月，顧祝同調升

第十六路軍總指揮，統率八個師。九月下旬，他率部進攻新鄭，在右翼側擊，切斷西北軍後路，占領新鄭車站，圍攻城垣奏功，西北軍第八方面軍主力遂全部瓦解，中原戰爭勝利結束。顧祝同進駐洛陽，奉命任陸海空軍總司令洛陽行營主任。十二月調任潼關行營主任。

其時隴海鐵路僅達河南靈寶，陝甘交通只靠驛路，國民政府命令未達關中，甘肅、寧夏、青海各省情形尤為特殊。顧祝同師進駐潼關，軍容壯盛，立樹聲威，陝、甘、寧、青各省軍政首長均先後來謁。顧祝同誠懇宣達政府德意，對地方有識之士熱情接待，又分派人員四處查訪，以期洞察輿情，明瞭實況，然後權衡得失，斟酌緩急，隨時向國民政府呈報，使上下無不盡之情，處理均適合人民願望，對地方偶發事件，開誠佈公予以明快處理，本息事寧人之宗旨化解互相敵對的怨恨，遂使西北各省擁護國民政府，政令推行無阻。

一九三一年五月，顧祝同由潼關回師鄭州，旋即奉召回南京，調任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兼第一師師長，警衛軍的武器裝備全是德國製造，軍事訓練均按德國操典進行，是一支精銳的勁旅，任務在於拱衛首都，作為建軍模範，當時國民政府聘請若干德國顧問，分派至警衛軍從事新式訓練，顧祝同被調派這一職務，顯示蔣中正對他倚重期望之深。他督訓部眾極勤，進步甚速。同年七月二

十日，石友三在河北順德叛變，顧祝同奉派為討逆軍總指揮，率領警衛軍並指揮陸軍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前往平漢鐵路線討伐。卅一日，在河北辛集、束鹿間擊潰石友三部主力，俘獲石部大部人眾及軍火，石友三逃往山東。

兩度主理江蘇省政

其後顧祝同奉委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當時，正值「九一八」瀋陽事變後不久，日寇擺足姿態，準備隨時內侵，江蘇為富饒之區，又是首都所在地，地位重要，他出任省主席後，特重綏靖地方，確保治安，支援前線。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戰役發生，日軍侵擾上海。顧祝同一方面協助軍事作戰，一方面督飭地方，發動民眾組織保衛委員會，加強民眾自衛武力，清查戶口，消弭盜匪，淞滬戰事綿延期間，長江南北各地能確保治安，顧祝同功不可沒。

淞滬停戰後，他立即督飭積極趕工，將一九三一年運河潰決的隄防迅速復原，以保障蘇北地區之安全，工程如期完成，河流恢復舊道，泛濫地區農民及時播種，恢復糧食生產。

江西剿共任總司令

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央軍第五次圍剿共區紅軍，分設東西南北各路軍，以北路軍為進攻主力，顧祝同解除江蘇省主席職位，出

任北路軍總司令，負責湘、粵、贛、鄂、閩五省的剿共任務，指揮五個集團軍的兵力，中央軍名將陳誠、薛岳、蔣鼎文都在這一路上。顧祝同執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剿共新原則」及「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築碉修路」之戰法，更以經濟封鎖配合軍事封鎖。共軍不甘困守，乃以其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軍團分途向中央軍進攻。中央軍由顧祝同策劃指揮，在宜黃、石灣地區，擊潰共軍攻勢。一九三四年春，顧部由撫州推進至南城，中共軍已勢蹙力絀，被迫退回贛南。八月，廣昌一役，共軍受到重創，死亡枕籍，無力再守其「蘇維埃地區」，全軍西走，展開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由於西路軍何鍵部疏於防範，共軍由夾縫出走。顧祝同又命薛岳率吳奇偉、周澤元兩個集團軍的九個師追擊。北路軍指揮機構改為南昌綏靖公署，顧祝同為主任。他把管轄的地區劃分為八個綏靖區。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召集下屬的軍長、師長部署綏靖計劃，要求各部隊緊密配合，三個月內肅清留在江西贛南和其他各地的紅軍，摧毀蘇區黨、政系統。這年四月三日，他晉升為陸軍二級上將。九月三日調任重慶行營主任。他於十一月一日在重慶行營主持軍政大計，以楊永泰為秘書長，賀國光為參謀長，繼續追剿共軍。

十一月十二日顧祝同參加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他被任命為國防委

員。八月二日，調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兼綏靖主任。到任後，整編黔軍，分區綏靖散股共軍，使貴州全境由紛亂轉趨平安，並督編黔軍，加以整訓，使成勁旅，調出省外，為國家出力。他又改組省政府，革新行政，使事權歸中央統轄，開啓貴州前所未有的現象。不久，逃亡中的共軍，侵擾四川，十一月國府軍事委員會成立重慶行營，調顧祝同為行營主任，以綏靖川康，剿滅共軍，安定四川為要務。他到任後，督率中央軍及川省各軍堵截追剿，共軍被迫走入甘肅，四川僅有殘眾待清，而四川各防區派系之爭頗為激烈。顧氏以寬恕待人，謙讓容眾之德性作為，與川康省各軍政人士相處，為表示推心置腹，重慶行營僅有直屬警衛一團兵力，重慶城郊內外警備仍由劉湘所部的一個師負責，以此感動地方軍頭服從，遂使川康整軍順利進行，中央政策付諸實施，全力修築川康、川黔公路開發，限時完成。

一九三六年夏，桂系軍人醞釀異動。八月二日，顧祝同奉命以重慶行營主任兼貴州省政府主席，加強地方軍力，使廣西軍隊不能侵擾黔境，讓貴州省政繼續革新。他非常注意發展交通，完成通過省境之川黔、川桂、川滇、川湘公路，又以黔省素為鴉片產地，通令各縣嚴禁種植與吸食，多年弊習全告革除。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西安事變，十六日，國民政府明令討伐張學良、楊虎

城，何應欽被派為討逆軍總司令，顧祝同為副總司令兼西路軍總指揮，出發前，他和胡宗南、劉峙等卅八名將領致電張學良，指出任何問題均可從長討論，付諸實施，要求釋放蔣中正回京。次日，他接到張學良邀請，同宋子文赴西安商談一切。就在這一天，他出任討逆軍西路軍總司令。第二天即與討逆軍總司令何應欽、東路軍總司令劉峙通電就職。當天，他又參加宋美齡召集的黃埔系軍官和空軍軍官會議。宋美齡要求他們採和平解決的辦法，以保障蔣中正的安全。會後，顧祝同未到討逆軍總部任職，留在南京協助孔祥熙及宋子文、宋美齡兄妹策劃和平營救蔣中正的策略。

十八日，何應欽接到蔣中正停止進攻西安的手令，才同意軍隊行動暫停三天。此時，顧祝同接到賀國光的報告，說「逆軍紛紛向西安集結，有與國軍對抗企圖」，並報告第四十六軍已抵華陰、潼關附近，餘部繼續西開。他聞報後，立即命令部隊停止前進。二十二日，他又致電龍雲，表示歡迎張學良與閻錫山的代表單獨會談，並希望龍雲推動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蔣中正於廿五日回到南京，廿九日，撤銷了討逆軍總司令部，任命顧祝同為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率三十多個師向華陰推進。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他參加了蔣中正召開的小型會議，研究對西安事變的後續動作，會後他指揮

陳誠的第四集團軍、衛立煌的第五集團軍、蔣鼎文的第二集團軍、朱紹良的第三集團軍，對西安方面施加軍事壓力。不過，他謹遵蔣中正委員長的指示，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策。一月五日，國民政府通過「陝甘善後整理辦法」，任命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初期，他駐節洛陽，張、楊部及共黨各派代表前往談商，經過多日洽談，未有結果，顧氏乃率行營進駐潼關，號令各軍作攻擊準備，仍傳檄嚴令叛軍歸順，以留轉圜餘地。一月二十九日楊虎城部首先表示就範，乃商訂處理辦法三項：(一)張學良所部東北軍開出潼關至蘇皖邊境整編。(二)楊虎城出國，所部整編。(三)共黨應發表宣言，歸順中央擁護三民主義，所部准予整編為一個軍轄三個師。二月八日，顧祝同率中央軍入西安。按照此三項辦法分別執行，卒以寬大與誠信的作風安撫反側，避免戰鬥，保全國力。

抗戰出長第三戰區

一九三七年六月廿九日，國民政府派何應欽為川康軍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顧祝同及劉湘為副主委，七月五日，何、顧兩人飛抵重慶，劉湘亦自成都來會，共商川康軍整編計劃。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掀起全面抗戰，日軍為配合華北作戰，謀在吳淞登陸，攻佔上海，打開進攻南京的大門，軍情緊急，何、顧均被召回南京，為便於統籌指揮作戰，國府軍事委員會決定成立第三戰區，

任命馮玉祥、顧祝同爲正副司令長官，由顧氏負責實際責任，指揮杭州、嘉興、無錫、江陰一帶的部隊。顧祝同將所轄的十七個師、六個旅、五個砲兵團及教導總隊、保安總團、警察總隊等部，區分爲淞滬圍攻區、長江左右岸守備區、杭州灣左岸守備區和浙東守備區，並拆除了江陰下游一帶的各種航標，在江陰沉大小艦船四十二艘、民船一八五艘、石子六千餘噸，構成江陰阻塞線，企圖抗擊日軍主力登陸及向縱深發展，確保上海和南京。

八月廿三日拂曉，日軍第三師團主力由張華濱，一部由吳淞登陸；第十一師團主力由川沙口和石洞口、一部由瀏河口登陸。九月二日，日軍第三師團攻占吳淞砲台。十一日佔領第一防衛中樞楊行，進至北站、江灣、廟行、唐橋、劉行一線。這時，日軍第十一師團也攻占了寶山城與羅店，並鞏固了瀏河口的登陸場。不久，日軍兩個師團連結成了正面約四十公里，縱深約十公里的登陸場。上陸的兵力約五萬人，坦克、裝甲車二百餘輛、重砲三百多門。戰火一觸即發，惟顧祝同遵守最高當局指示，爲保存實力，俾達強韌抗戰之目的，著第十五集團軍即時轉移。又令第九集團軍「向北站、江灣、廟行、蘊藻濱右岸之線轉移，占領預築陣地」。要求各集團軍都要節約兵力，保留預備隊。

九月廿日，馮玉祥辭去戰區司令長官職務，由蔣中正兼任。顧祝同以副司令長官的名義完全負起了全部責任。九月廿一日，戰區調整指揮關係，以張發奎爲「右翼軍」司令，擔任蘇州河以南至杭州灣作戰；朱紹良爲「中央軍」司令，擔任北站、江灣、羅店、萬橋及其以西作戰，薛岳爲「左翼軍」司令，擔任瀏河、嘉定、昆山、福山地區作戰。上海方向的作戰由陳誠統一指揮。顧祝同遂將長官部移至蘇州，後又移至無錫。

九月廿七日，日軍增援部隊第九、一〇一師團及重砲第五旅團分別在寶山、吳淞附近上陸，於十月一日攻占劉行。同時，日軍第十一師團也由羅店向西進犯。顧祝同雖命令第十八軍頑強抗擊和第四、第六十六軍多次反擊，仍不能阻止日軍的猛烈攻擊，被迫於十月三日命令左翼軍撤至唐橋、陳行、廣福、張家宅、瀏河一線陣地。

十月六日，日軍第十三師團在寶山附近登陸增援。七日，日軍第九師團強渡蘊藻濱河，在黑大黃宅、南橋亭建立橋頭陣地。顧祝同企圖殲滅渡過蘊藻濱河之敵，恢復劉行、羅店原陣地，阻止敵軍擴張戰果，乃於十九日組織大規模的反擊。他命第二十一集團軍以第四十八軍的六個團編成一路，向唐橋、顧村攻擊；命第十九集團軍以第六十六軍的四個團，編成第二路向劉行攻擊，命第十五集團軍以第九十八師編成第三路，向羅店攻擊；命第九集團軍一部向黑大黃宅及其以東地區進行反擊。廿一日十九時，反擊開始。但經一夜激戰，各路均無進展，廿二日反

被日軍突破防禦，向大場進攻。廿六日，顧氏命中央軍和左翼軍各以兩個師向突進到走馬壩的日軍反擊，也未成功。當日日軍攻占大場，繼續南進時，顧氏只得命部隊且戰且退，中央軍退守法華鎮沿蘇州河南岸至姚家宅一線；左翼軍退守姚家宅、江橋、小南翔、唐家橋一線。

指揮若定力挫日寇

十一月五日，日軍第十軍團第六、十八師團在金山衛左右兩側海岸登陸，實施側背迂迴，企圖切斷第三戰區的退路，將顧部包圍。當時，第三戰區的兵力已增至五十六個師七個旅，顧祝同調整部署時，惜未能阻止日軍登陸。日軍上陸後，分兵兩路向張堰、松江、呂巷、金山、太平橋、廣陳方向擴展進攻。顧雖然急令各部調動五個師的兵力分頭堵擊，但未能阻止日軍的前進。至七日，日軍攻占金山，逼進松江，占領楓涇，突破姚家宅、北新涇等數處守軍陣地。這時不但上海危在旦夕，第三戰區幾十萬部隊也有遭覆滅的危險。爲保全主力，守衛南京，顧祝同根據蔣中正的指示，於十一月八日廿一時，下達全線撤退的命令。並在福山至吳縣、江陰至無錫建立太湖北走廊防線；在南潯至崇德、吳興至臨平建立太湖南走廊防線。

第三戰區一部分兵力退至南京，歸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指揮。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南京危殆，國民政府撤至武漢，正式任命顧

祝同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並兼江蘇省政府主席，戰區經濟委員會主任，戰區戰地政務黨務委員會委員，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部移至安徽屯溪，後又移至上饒，管轄江蘇、浙江、福建、皖南等省區。他下屬的部隊有唐式尊指揮的第二十三集團軍、劉建緒指揮的第十集團軍、羅卓英指揮的第十九集團軍、潘文華指揮的第二十八集團軍、陳儀指揮的第二十五集團軍、上官雲相指揮的第三十二集團軍及劉多荃等部。一九三八年一月六日，共產黨的新四軍軍部，也編入第三戰區，各部隊性質龐雜，顧氏與之均有良好關係，被認為有一「取將之才」。此後，第三戰區的部隊處在日軍三面包圍中作戰，他採取穩定內部，持久防衛，保存實力的方針，但在徐州、武漢會戰時，仍對日軍發動過皖南攻勢、淞滬皖邊作戰、福州攻略之戰、肖山諸暨之役、閩海之役、浙東之役等，打擊和牽制日軍，戰功卓著。

處理新四軍之事件

抗戰時期，顧祝同處理新四軍事件，頗引起中外矚目。新四軍係由江南中共地下武力編成，抗日爆發，國共合作後編入第三戰區的戰鬥序列，該軍下轄四個支隊（每一支隊相當一個團），以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由顧祝同直接指揮，指定在南京、蕪湖一帶為作戰地境。這支部隊缺乏訓練，戰力薄弱，對面日軍卻強大精良，為培養新四

軍的戰力，顧祝同對新四軍私自擴充，多予優容。詎料，新四軍一意擴充，避免作戰，而且自由行動，偷襲中央軍，一九三九年後，變本加厲，顧氏竭力忍讓，嚴令葉挺，恪守紀律，苦無效果。一九四〇年七月，國民政府為消弭共軍在各地與中央軍衝突，作成提示案由參謀總長何應欽與周恩來、葉劍英協商同意，重劃新四軍作戰地境，限令於一個月內全部開往指定地區。但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竟於八月與襲擊山東省政府的魯西共軍相呼應，趁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部在江北與日軍激戰之時，以主力渡江，攻佔泰興之黃橋，九月再陷泰縣之姜堰，十月復與北路共軍夾擊韓德勤部，韓部八十九軍竟為所敗，軍長李守維死難。嗣後中央嚴令新四軍開赴黃河以北作戰。十二月九日，再令葉挺、項英限即將在江南兵力於月底以前先移至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底前再移至指定地境。新四軍不惟抗命，且企圖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帶，竟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集中其在丹徒、句容、金壇、溧陽、郎溪等地七個團兵力，乘中央軍第四十師南調換防之時，分途圍攻該師及上官雲相總部。顧祝同為整飭綱常維護軍紀，乃毅然下令制裁，自六日至十四日，一週間，將新四軍全部解散，拿獲軍長葉挺解送中央，交軍法審判。軍事委員會於十七日明令取消新四軍番號。自是長江以南共軍得以肅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

太平洋戰爭爆發，顧祝同指揮的第三戰區的戰略地位益形重要。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美國空軍將領杜立德率機群轟炸日本東京後，安全降落第三戰區轄境，使日軍視顧祝同的軍力為眼中釘，為解除對日本本土空襲計，乃於一九四二年五月上旬發動對第三戰區轄境內的浙贛鐵路沿線要地及飛機場之攻戰。顧祝同遵守最高統帥部的戰略指導：於消耗日軍戰力後，逐次轉移避免與日軍決戰。六月中，浙贛鐵路全線均失陷，他仍本預訂計劃策勵部眾於戰鬥中培養戰力，至八月初旬開始反攻。八月底即將全線日軍擊潰，恢復戰前原有態勢，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在第三戰區再未有大規模的企圖與作戰。

東南蘇、浙、贛、閩各省為中國經濟重心，工商企業集中於此一地區。顧祝同既指揮此地區軍政，為保全國力，增加生產，積極輔導沿海民營工商企業向內地遷移重建。同時更設立戰區經濟作戰處，一面管制物資，節約消費，一面鼓勵商民搶購淪陷區物資運濟後方，支援對日作戰。一九四四年設立戰區經濟委員會顧祝同自兼主任委員，趙棣華任副主委，對奠立戰後經濟復興基礎貢獻頗多。

第三戰區鄰接南京上海三角地帶，為日本對華政治作戰中心所在。一九三九年冬汪精衛叛國降敵後，顧祝同審度情勢對戰區政治工作非常重視，奉命設立第三戰區戰地黨

政委員會兼主任委員，負協調督導戰地黨政軍全責。九月，國民政府頒行「縣各級組織綱要」，顧祝同督導所轄各省實施，至一九四三年全國實施新縣制的廿一省一一〇六縣，其中他治下六省所轄各縣全數實施新縣制，正是戰時推行地方自治最早之省份。

抗戰後期，顧祝同升任軍委會贛州行轅主任，仍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又指揮第七及第九戰區作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顧祝同先以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身分接受駐浙江的日軍投降，然後又於九月八日參加了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在南京接受中國戰場日軍的投降儀式。

剿共戰中策劃戰略

一九四五年五月，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顧祝同第三度當選中央執行委員，一九四六年一月，調任徐州綏靖公署主任，負責山東、江蘇、河南、安徽四省地方治安事宜，當時共軍勢力方張，顧氏鞏固點線，擴大控制面。五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中央軍事制度變革，顧祝同接替何應欽出任陸軍總司令，他於五月十八日到職，籌組新制陸軍總司令部，六月初正式成立。

不久，中共擴大挑起內戰，華北、華中一片烽火，顧祝同坐鎮華東戰略要衝徐州，成立陸軍總部徐州指揮所，統一指揮徐州、鄭州兩綏靖公署的部隊。他把兩轄區內廿四個整編師六十個旅共四十五萬人，分成三個

機動兵團，由湯恩伯、王敬久、孫震擔任一、二、三兵團司令，從徐州沿津浦路攻向濟南，準備肅清山東境內的共軍，把共軍主力迫向黃河以北地區。他命令部隊採取穩紮穩打的方式，逐步推進，步步為營，戰事頗有進展。

一九四七年一月，美國特使馬歇爾調停計劃失敗，黯然返美。華北共軍大批南下，在山東及河南兩地掀起戰端，顧祝同改組陸軍總部鄭州指揮所，由孫震任主任，負責平漢鐵路信陽以北的軍事指揮，他自己則鄭州、徐州兩地兼顧。當時黃河堵口工程正加緊進行，共軍知道這一工程完成，黃河恢復舊道，將使劉伯承、陳毅兩部失去聯絡，因是多方破壞，導致新鄉與黃河鐵橋之戰，砲聲震天，聲達鄭州，顧氏沉著應付，終於粉碎共軍謀略，將花園口堵口工程於當年三月十五日快速完成。

一九四七年三月，由徐州北進的中央軍銳意進取，向共區猛攻，於四月上旬攻占魯南山區，打通了津浦路兗州至濟南段和臨沂至兗州的公路，隨後，從臨沂至大汶口一線向魯中山區發起進攻。廿六日主力指向新泰、蒙陰，於廿八日占領蒙陰。五月初，攻擊共軍華東野戰軍，共軍被迫向東北方向撤退，遂急令其第一兵團進占坦埠、沂水一線；第二兵團向博山、張店方向進攻；第三兵團集結於新泰、蒙陰地區，待第一、第二兵團攻勢得逞，協同向東進攻，力圖殲滅共軍華

東野戰軍，可惜七十二師及七十四師進展太快，反遭共軍包圍，七十二師在泰安被殲，七十四師在孟良谷覆沒，師長張靈甫殉職，使山東剿共戰，幾乎功敗垂成。顧祝同鑒於失敗的教訓，集中兵力，重點突破，經兩月努力，先收復黃河以東各縣，包括久被共軍盤據之泰安、蒙陰、萊蕪、鄆城等地，十月一日更收復煙台。自此華北共軍與大連蘇俄軍之連絡始被截斷，而津浦鐵路沿線亦告肅清，久為共軍破壞之南北交通線終於十一月第一次宣告通車。

顧祝同在徐州，深知中共滲透之慣技，遂在隴海線以北，津浦線以東地區率先成立若干綏靖區，尤重視民眾組織及情報搜集，對於幹部訓練更特加重視。山東、江蘇境內共軍於一九四七年底卒被肅清，這是主要因素之一。此一時期徐州兩度情況危急，共軍一度進至九里山，離徐州市區不過數里，當時徐州市內並無大軍駐守，國軍勁旅又馳援不及，而共軍卒因無法獲得情報，不明徐州虛實，未敢輕進而自動撤退。

一九四七年七月，國民政府下達剿共戰亂總動員令。原盤據晉南的中共劉伯承部，於八月乘隙偷渡黃河，以其主力五個縱隊進入大別山區與李先念部相結合，是年底且進出長江流域，遂使國軍後方為共軍滲入，黃河以南、漢水以東、長江以北之廣大地區為之不寧。國民政府為適應局勢特頒「華中戰場重新劃建綏靖區綱要」，傳統一綏靖區軍

政指揮。一九四八年一月，顧祝同遵令召集江蘇、山東、河南、安徽四省政府主席，國民黨省黨部負責人及所轄之十三個綏靖區司令舉行綏靖會議，商討綏靖區制度具體實施方案。

一九四八年五月，國民政府公布新憲法，改組政府，顧祝同升任參謀總長，余漢謀繼任陸軍總司令。當時，東北局勢惡化，華北陷入紊亂。六月，陸軍總部撤銷徐州指揮所，改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以劉峙為總司令，華北軍情日趨惡劣。七月上旬，國府召開「南京軍事會議」，會中顧祝同作了戰略問題的方案報告，提出要停止戰略進攻，鞏固長江以南防線，阻止共軍過江。把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部隊編為幾個機動兵團，在江南組建二線兵團，以求再度奪回戰略主動權。

七月廿五日濟南失守，徐州以北據點盡失，北平、天津已陷入中共包圍圈。十月中旬，顧祝同召集參謀本部各廳長研擬全盤作戰計劃，獲致的基本重要決定是：在華北保持塘沽、北平、天津等戰略要地，牽制由東北南下的共軍。在徐州則採取防禦攻勢，武漢地區保持機動作戰，由白崇禧統一指揮徐州及武漢兩地的軍事行動。這一計劃由蔣中正總統批准實施，可是命令下達後，白崇禧拒不到職，顧祝同只好自己到徐州部署，十一月四日，他在徐州「剿總」召開的作戰會議上說，守江必守淮。要放棄次要城市，集

中兵力守徐州。在徐州至蚌埠鐵路兩側取攻勢防禦，以鞏固長江護衛南京、上海。因而他決定調整沿鐵路一線部署的態勢，令黃伯韜的第七兵團及第一、第二綏靖區的部隊撤至徐州以東，運河兩岸；第二兵團位於河南永城、安徽碭山地區；以第十三兵團位於泗縣、靈璧；第十六兵團位於蒙城；第四綏靖區劉汝明部位於臨淮關附近，以便一處作戰，各方支援。

可惜顧祝同的計劃尚未完成部署，共軍已恢復展開攻擊，十一月十一日黃伯韜的第十三兵團被圍於碾莊，至廿二日全軍覆沒，黃伯韜自戕。接著增援的胡璉第十二兵團，李延年第六兵團及劉汝明第八兵團均陷入重圍，各自為戰，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初，徐蚌大會戰結束，國軍主力喪失殆盡。

保存戰力功不可沒

顧祝同畢竟有遠見，早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即呈請蔣中正總統核准，在台灣訓練新軍，成立台灣訓練司令部，派孫立人為司令，另在廣州、漢口也成立訓練司令部，召集長江以南卅八個戰略後備師，施以嚴格訓練，可惜因人事、經費牽制，未能認真落實，僅台灣新軍在美軍顧問協助下，小有成就。

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總統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總統，顧祝同主張把長江防線化為兩段，在江西湖口以西至湖北宜昌，由白崇禧指揮四十個師防守，湖口以東至

上海由湯恩伯指揮七十五個師防守。可惜李宗仁力主和談，無心作戰，局勢急轉直下，共軍乘隙渡江，於四月廿日自荻港、江陰等地渡過長江，大舉進兵江南。顧祝同於廿二日離南京，經杭州至上海，國軍亦於是日撤出南京。

一九四九年五月為了維繫軍心，顧祝同重任陸軍總司令。七月十三日，國民黨非常委員會在廣州成立。當時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閻錫山與代總統李宗仁對軍事權責頗多歧見，蔣中正總裁乃於非常委員會下設立軍事、財政、外交三小組，並自任軍事小組召集人，以閻錫山、白崇禧及顧祝同為小組委員。十月初，顧祝同向非常委員會提出「軍事革新綱要」，強調自戕亂以來，和戰不定，敵友不分，軍紀敗壞，民心士氣大受影響。為挽救危亡，擬定革新軍事要點：確定政略戰略。貫徹精兵主義。培養信實風氣。健全各種制度。嚴肅軍紀風紀。加強敵後作戰。同時擬定詳細實施辦法提經會議通過，付諸實施。十月三日蔣總裁自廣州飛臺北。四日，李宗仁忽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白崇禧所部向廣西撤退。因此廣州遂於十月十四日撤守。顧祝同於十三日自廣州飛臺北，隨即轉飛重慶指揮西南軍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行政院特任顧祝同為西南軍政長官，胡宗南為副長官，九日晚，蔣總裁駐節成都軍校，獲悉張群在雲南被盧漢扣留，盧漢並致電劉文輝促扣留蔣

總裁。四川局勢危急，顧祝同力勸蔣總裁於十日飛往臺北。他則坐鎮成都，督飭肅清劉文輝殘存成都之部隊，掩護行政院各機關空運海南撤退至臺灣，命令胡宗南部集結成都附近。俟一切都部署完成，他將四川地方部隊交由唐式遵、王纘緒指揮，特派胡宗南代理西南軍政長官，指示給予共軍逐次消耗後撤退至西康省境，與西昌賀國光部結合，成立大本營，建立游擊基地。十二月廿五日，顧祝同自成都飛海南島指揮。

盧漢在昆明扣留張群時，陸軍總司令部正駐防在雲南曲靖，於是顧祝同下令第八軍、第二十六軍，由陸軍副總司令湯堯指揮進攻昆明。十二月十九日前軍已進入昆明市，迫使盧漢將扣留之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二十六軍軍長程萬先後釋放，第二十六軍停止攻擊。十二月二十七日，成都失守，顧祝同在海南島命令第八軍、第二十六軍集結蒙自以南地區，徐圖反攻。一九五〇年一月行政院遷移臺北辦公，顧祝同返臺述職後，奉命於一月十三日飛往蒙自宣慰第八軍、第二十六軍官兵，計劃將第二十六軍空運海南。第八軍掩護空運完成後轉進滇西建立游擊基地與西康國軍相呼應。十五日顧祝同以參謀總長兼代國防部長兼西南軍政長官的身分，由蒙自飛往大本營所在地西昌，指示賀國光、胡宗南作戰機宜。賀國光時為西康省主席、兼西昌警備總司令，胡宗南為西南軍政副司令長官兼代長官，顧祝同懇切慰勉賀國光，

希望他留在西昌協助胡宗南，維持西部大局。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晚，劉伯承所部的三個軍，由黔西間道進攻蒙自，第八軍及第廿六軍被迫撤向滇西、滇南。十六日晚，顧祝同乘機自大本營西昌飛抵蒙自上空，機場已陷落，不得已逕飛海南島。後來第八軍在昆明以南被殲，湯堯被俘。第二十六軍退入越南。三月廿七日大本營西昌失守，大陸全部陷共。

顧祝同於三月廿六日飛抵台北，旋奉命兼代國防部長，一九五〇年三月，蔣中正總統復職，行政院改組，顧祝同辭卸參謀總長職務，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充何應欽的副手，一九五九年七月轉任國防會議秘書長。一九六八年再調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委，一九七二年改任總統府一級上將戰略顧問，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病逝台北，高齡九十四歲。（劉先軍撰。參採顧祝同著墨三九自述、王成聖著：顧祝同與西南、馬樹禮：懷墨公談統一）

戴陽（一九二五—一九八一）

以色列外交部長
以色列國防部長

以色列的開國英雄，在以阿戰爭中立有殊勳的以色列前國防部長戴陽（Moshe Dayan）去世已廿餘年，赫赫戰功，漸成塵跡。以

色列年輕的一代，對戴陽的英雄事蹟已逐漸模糊，但戴陽在以色列的建國史上，必將留下永不磨滅的一頁。不過由於時空改變，善用理智的以色列人，對這位英雄人物的功過，已理性的重作評估。予以蓋棺論定的結果，是戴陽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中的傑出表現，尚不如他在一九七三年以阿戰爭中吃敗仗，對國家的貢獻大。由於「常勝英雄」也打敗仗，使以色列人認識到，人世間沒有真正的英雄，英雄也有失算的時候，換言之，「英雄」是別人崇拜的名號，戴陽本人仍是一介凡夫，並無三頭六臂，所以以色列人要想世世代代，長期生存發展，唯有擺脫英雄崇拜，認真思考未來應有的做法和應走的路才行。戴陽在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中，以少勝多，以數萬之眾，在短短六天之內擊潰卅餘萬阿拉伯大軍，進迫埃及首都開羅。進展之神速，曾被西方軍事戰略家視為奇蹟，當然戴陽也成了軍事奇才，博得舉世崇拜。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軍事部門，也曾派代表秘密赴以，向戴陽取經，獲得熱誠的傳授。

戴陽是巴勒斯坦土生土長的猶太人，一九一五年生，一九三七年，廿一歲的戴陽在巴勒斯坦加入猶太人游擊隊，與殖民巴勒斯坦的英國佔領軍作戰。不久，在一次戰鬥中戴陽被俘，被關在英國人的監獄中。後來，他以交換條件，協助英軍和法國維琪政府在巴境的軍隊作戰而獲釋。此後，他即替英軍服務，在巴勒斯坦及敘利亞境內襲擊法軍，

不幸在一次戰鬥中，他左眼中彈，從此失去一隻眼睛，開始戴起眼罩，後來成了他英雄標幟。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他是投入建國行列的先鋒，由於有豐富的作戰經驗，使他成爲以軍領導者，這位行伍出身的將軍把以軍訓練成鋼鐵勁旅，南征北戰，開疆拓土，無戰不勝，無攻不克。尤其是在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中，戴陽率軍西出西奈半島，以戰車爲先鋒，短短六天時間，擊潰四面圍堵的阿拉伯大軍，在西奈沙漠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動，殲滅號稱勁旅的埃及第三軍，把埃軍切成兩半，逐一消滅，大軍直逼開羅，距離僅十二公里，使埃及全國震動，不得不屈膝求和。

戰後，把廣大的西奈半島任由以軍佔領，直到埃及總統沙達特後期。頗有才具的沙達特，一改納瑟的予智自雄，改變作風，委屈求和，以色列爲了永久的生存，也有和解之意，雙方一拍即合，經由談判，達成協議，以軍於八〇年代撤出西奈，歸還埃及。但六日戰爭中，戴陽的軍事天才，卻博得舉世讚佩。

這位一舉打敗三個阿拉伯國家的戰爭英雄，戰後出任外交部長，表現得同樣出色，他深知以色列的生存，繫於和阿拉伯人的和解，極力促成和埃及建交。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龍頭，只有和埃及保有外交聯繫，才能避免中東地區的硝煙戰火。這位在經戰火千錘百鍊的軍事長才，深知戰爭可怕，勝負難

料，所以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鴿派，令世人跌破眼鏡。

戴陽於一九七九年出任外長，奠定以埃和平基礎後，轉任國防部長，負責整軍建軍，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六日，因心臟病在任內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一九七三年，第二次以阿戰爭，領軍在西奈作戰的戴陽卻吃了大敗仗，使他英名蒙塵，名譽掃地，英雄的光環，毅然失色。然而在戴陽死後，以色列又遭遇一連串的衝突事件，例如以軍入侵黎巴嫩、波灣戰爭、巴勒斯坦動亂等事件，使以色列人體認到戰勝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用神話塑造英雄也解決不了問題。惟有妥協退讓，給別人一片天，才能保住自己的一片天。因而以色列人於建國數十年後，重新檢視那些開國元勳和戰爭英雄的功過，發現戴陽的和平主張，比他的戰爭功勳，對以色列的貢獻要大得多。所以與其把他歸類爲英雄，不如把他視爲和平先驅，反而更名副其實。（劉先軍撰）

潘錦端 (一九一六—一九九六)

國民大會代表

廣東省參議員

戰時廣東兒童保育院院長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副教授兼圖書館主任

潘錦端山西省榮河縣人，幼年隨父母遷

居廣東省番禺縣即現今廣州市。民國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農曆十月初九日生。

潘家世代書香，父親潘培蘭遜清舉人。追隨國父孫中山從事推翻滿清帝制，創造中華民國，爲革命黨同盟會會員，任孫文大元帥府秘書暨廣東省數縣縣長，政聲卓著。母親李桂舸，山東名門望族，端莊嫺淑，與潘培蘭結爲夫婦，育子女多人，錦端居次。潘培蘭逝世後，母親扶孤育幼，備極辛勞，錦端力學上進，協助母親持家務，養成獨立自主性格，巾幗不讓鬚眉。錦端才華內檢，常以繼承父志，光大潘家門楣自許。廣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時，以特優生保送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就讀教育系，得學士學位，深受崔載陽、鄭彥棻兩院長器重，留校任助教職。抗戰軍興，錦端投身救亡圖存革命工作，先後任廣東省動員宣傳委員會婦工組長，與鍾天心、林苑文夫婦極爲友善，嗣任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女士創設之戰時兒童保育院廣東第二分院院長，率領數百男女苦難兒童，奔波流離，備嘗艱辛，貢獻良多。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應廣東支團李國俊主任邀請，擔任廣東支團部婦工組長，旋因李漢魂、吳菊芳夫婦深佩她的才能，調任廣東省政府秘書，並當選廣東省參議會參議員。

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三民主義青年團在重慶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錦端當選代表出席，發言表現優異，識見超卓，選入中央訓練團青幹班第五期受訓結業，適當

時青幹班改為中央幹部學校，錦端留任訓導員，兼青年軍女工作大隊指導員，旋調任中央團部婦女工作處主任組員、組長。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國府還都，結束訓政工作，實施憲政體制，第一屆國民大會成立，當選為西北區教育團體國大代表，直至一九九二年大會修憲改選，始行解除代表職務。

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大陸局勢逆轉，隨中央政府播遷台灣，此時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組織合併，錦端重回教育崗位，擔任行政專科學校副教授兼圖書室主任，（後改為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民黨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中央婦女工作會，由常委宋美齡任指導委員會指導長，羅衡任籌備主任，旋由錢劍秋接任主任，錦端任秘書，未幾升任副主任，任期長達二十餘年之久，其間並兼任婦聯總會委員，中國婦女童子軍常務理事，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副教授，憲政研討委員會委員，並於一九六三年當選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對黨國多所獻替，民國七十六年屆齡退休，受聘為中央黨務顧問，兼任國家統一促進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民代財務管理委員會委員。

錦端於民國三十三年在重慶與祁宗漢將軍結婚，由王世杰證婚，康澤為男方主婚人，李修天為女方主婚人。夫婦鶼鶼情深，在黨政各方面均有所成，育有一子二女，長子祁宏文，次子祁宏英，均優秀有為，惟長女蓓蓓因腦性小兒癱瘓病夭折，常自責公爾忘私，疏於照顧，引為遺憾，錦端天性純厚，母女情深，可見一斑。

一九八六年民國七十五年已七十高齡，依例應辦退休，時值台灣各縣、市長及省市議員選舉在即，中央極需協助完成，特准延長任期一年，前往各縣督導選務，夙夜靡懈，風雨無阻，長期車旅勞頓，在辦公室內中風昏厥，急送台北診所住院兩週，痊愈回家，旋又上班繼續工作，一九八七年底，正式退休，移居加拿大多倫多。

一九九六年同夫婿祁宗漢伴往廣州市探親掃墓，此後在加拿大常與幼年總角交陶澐、羅潔瀛夫婦及陳魯慎、張佩常等同學相往還，不幸再度中風腿折，須以輪椅代步，幸有夫婿及兒女爭相照顧，苦中有樂，頤養天年，終以因心臟衰竭，病逝於多倫多北約克綜合醫院。

錦端天資明敏，思想慎密，生活嚴謹樸實，責任感極重，治事力求完美。常以婦女齊家報國，為社會組合之重要結構，身體力行，並以之期於友朋。綜其立身行事，對黨國卓有貢獻，曾受頒勝利勳章、實踐獎章、華夏獎章、童子軍各級獎章獎狀等殊榮。在政府播遷台灣初期，文藝幾為一片沙漠，她特為發動台灣省成立婦女寫作協會，會員均一時之選。在兼任婦女雜誌社長時，先後撰寫社論百餘篇，二十餘萬言，好友名作家畢璞女士促她付梓，並樂任整理校刊之勞，卻以文稿均係適應當時政情需要，並非個人思

想發抒，不欲問市為辭，其謙遜虛懷，淑德懿行，足以傳諸後世，為婦女界的模範。（康僑撰）

葉光（一九〇六—一九九七）

遠征軍少將參議

國大代表

紅十字會台灣分會總幹事

葉光字景春，原籍浙江雲和縣，生於民國前六年（一九〇六年）農曆七月二十七日，民國八十六年（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日，因心臟功能衰竭在台北逝世，享壽九十三歲。

葉家世代務農習醫，造福桑梓，為浙江雲和家鄉的望族。民國建立以後，國父孫中山力倡民權學說與三民主義的理論，葉光見到國家百廢待舉，於是離鄉前往南京求學，一九三〇年七月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政治系。

北伐成功以後，全國統一，各方面都急切需用人才，他經父執輩引荐，到安徽省政府財政廳任職。一九三二年日軍侵華，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東三省，他見國難嚴重，於是毅然投軍報國，迅即獲得陳誠將軍的賞識，延入戎幕參贊機要，策劃戰地政務，對安定戰區民心，很有貢獻。從安內攘外期間的軍委會南昌行轅，以至抗日戰爭期間轉任於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與軍政部，以及

赴緬甸的遠征軍之役，均盡心報國，公忠無私；歷經晉陞為陸軍少將，榮獲勝利忠勤等勳章。

對日本抗戰獲得最後勝利，政府還都南京，葉光奉派赴南京，在聯勤總司令部及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工作。一九四七年，全國推行憲政，葉光返鄉競選，高票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積極協助推行憲政。

國民政府遷台後，葉光一度分別在台灣省警備總部及國防部襄贊軍機，後來從國防部參議任內榮退。受聘為光復會委員，專注於憲政改革的研究。他為了實踐研究國父孫中山與蔣介石總統的革命思想理念，除了參與革命實踐研究院，先後任研究員及輔導員外，並應前故司法行政部長林彬的聘請，擔任司法行政人員訓練早期各班的教務主任，對台灣司法界人才的培育，盡瘁心力。

一九五九年以後，他應蔡培火的邀請，擔任紅十字會台灣分會總幹事，當時轄下有九所血液銀行，供應病患血液。不過血液大部分來自賣血人，違背時代潮流，於是在一九七四年發動各界，創立中華民國捐血運動協會，並任常務理事及中華血液基金會董事，推行全面無償捐血制，嘉惠病患，直到現在。台灣今天能有如此健全的捐血制度，葉光當推首功。

他的夫人高采薇，也是浙江雲和縣的望族子女，家學淵源，畢業於杭州惠興女子名校，美德賢淑，持家有方，又因受西方教育

的影響，通達識遠。一九三三年與葉光在衢州結婚，六十多年來，家庭和樂美滿，育有五個兒子，都由她撫育成長，皆學有所成，並得諸賢媳內助，齊家立業，貢獻社會。因積勞體弱，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安詳逝世，享壽八十一歲。

葉光有五位公子：長子葉天行，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經濟系及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服務公職已三十九年，是首屆高等考試新聞行政人員第一名，及首屆甲等特考新聞行政人員優等。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副局長，現任中華民國駐盧森堡代表。

次子葉天均，國立台灣大學機械系畢業，並獲美國耶魯大學應用科學博士，現任職於美國貝爾研究室，為高級資深研究員，業餘兼任紐約中國民族樂團團長。

三子葉天洪，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系畢業，現任台灣區合板製造輸出業同業公會總幹事。

四子葉天沛，逢甲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現任美國貝泰公司的工程師。

五子葉天正，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獲得美國賓州大學物理學博士，現任美國萬國電腦公司高級主管。

葉光的五個媳婦，都各具才華。長媳孫步霏，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曾擔任台灣電視公司婦女與家庭節目製作人、節目導播及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中文講座多年，是業餘中國剪紙藝術家及散文作家。

次媳張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博士，在美執業小兒科醫師，曾任美國陸軍醫院小兒科主任。

三媳鍾美美，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精通中國命理醫術，濟世活人，積善行德。

四媳周元寧，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系畢業，現在美國任工程設計顧問。

五媳李世緯，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畢業，與五子葉天正同為賓州大學物理學博士，服務於同一機構。

葉光夫婦的孫輩教育，各自初中、高中至大學畢業，以及進入社會服務，各有專長，力求上進，均受到各界的愛重。

葉光一生歷經戰亂，養成他規律生活，勤勞節儉的習慣，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畢生對國家社稷貢獻卓越，家庭美滿，且享高壽，人生至此，應無遺憾。（康 僑撰）

黃基（一八八四—一九二五）

少年中國周刊主編

申報駐京特約記者

黃基，字遠庸，筆名遠生，江西九江人。生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出身書香門第，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時就讀於南潯公學，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對清末黑暗現實不滿，嚮往進步與自由。但是，他為家人所迫，曾去應德化縣試，得中秀才。同年又應江西鄉試，再中舉人。次年赴京參

加會試，又中進士。兩年內，連中三榜，其在江西省內文名大噪。

黃基中進士後，獲「知縣即任」資格，本可走馬上任，但他無意仕途，經再三申請，獲准赴日本中央大學學習法律。一九〇九年學成回國，被清政府任命為郵傳部員外郎、參議廳行走和編譯局纂修官。但他目睹清末官場黑暗、腐敗，就不時提筆就一些國內、國際問題為京、滬報刊撰稿，為改善國家和社會狀況而呼號。辛亥革命後，他便絕意仕途，專事新聞工作，先後主編過《少年中國》、《庸言》月刊，擔任上海《申報》、《時報》駐京特約記者，並為《東方雜誌》等報刊寫稿。在短短四、五年新聞記者生涯中，他以其深厚的中西學問基礎、超人的社會活動能力和卓越的採訪寫作技巧，一舉而成為民國初年新聞記者的巨擘，被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稱之為「報界之奇才」。

他的政論，洞朗軒豁，深入淺出，剖微顯著，為京滬各大報爭載；他的通訊，莊諧並進，幽隱畢達，發人深省，創一種新的新聞文體；他的採訪，才思敏捷，消息靈通，文筆流暢為當時新聞界所稱頌；他的辦報思想，要求資料確鑿，判斷切實，指斥時弊，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黃基以撰寫新聞通訊見長，後人為他出版的《遠生遺著》中，通訊有一百五十三篇，佔篇目的三分之二強。黃天鵬在《新聞文學概論》中說：「自黃遠

生出，而新聞通訊放一異彩」。他寫的新聞通訊特點是，題材重大，記載翔實。他中過進士，又留過學，又在清前做過官，對國際時事和國內政界非常熟悉，這為成爲一名政治記者提供了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他經常周旋於民國總統、內閣總理、各部總長、各政黨要人中間，因而消息靈通，能夠採訪到別人採訪不到的重大新聞和內幕新聞。在沒有充分的事實之前，他決不逞臆懸談，但如果有失誤處，他也一定更正，並會認真追查。所以，他的通訊，是民初政治風雲的真實而詳盡的記錄。

他憂國憂民，痛下針砭，他曾以那如椽之筆，對袁世凱的黑暗統治和形形色色的官僚、政客痛加鞭斥，嫉世憤俗之情，溢於言表。而且他的文學根底，又善於捕捉各種細節，把雜亂無章的議論或談話，編成一段很有條理的文字，或則觸類旁通，引伸出許多道理來。他用詞繪聲繪形，鬚眉畢現，幽隱畢達，涉筆成趣，嬉怒笑罵，皆成文章。由於他的通訊鞭辟入裡，妙語天成，故聲名鵲起。他在《仄悔錄》中，認爲新聞記者應有四能，即腦筋能想、腳能奔走、耳朵能聽、手能寫。他要求廣泛接觸社會，深入調查採訪，客觀公正寫作。由於他的基本態度是擁戴袁世凱，反對孫中山，呈現出「袁氏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必欲殺之」。爲了避禍，他出走美國，到達舊金山不久，即爲當時國民黨美洲總支部負責人林森懷疑爲奉袁世凱之

命來美籌款的，便派人跟蹤他，並利用他去唐人街一酒樓赴宴時，對他下手。刺客是旅美僑工，老同盟會會員，當時林森的衛士。黃基被刺殺時，年僅三十一歲，他短短的一生，爲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過重要貢獻，有深遠的影響。（沈津撰）

代 郵

作家沈津先生：謝謝您惠賜大作，因找尋大作有關人物照片，遲未刊出，甚爲抱歉，有事奉商，敬請賜示最近通訊地址，以便通訊聯絡。 編者。

蔡維屏（一九二一—一九九七）

外交部美洲司司長

外交部次長

駐美代表處代表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駐沙國大使

總統府國策顧問

蔡維屏，南京市人，民前一年（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生。青少年時期就讀於南京金陵中學，穎慧好學，金陵中學師生同聲讚佩。

在金陵中學三年中，有一天，生理衛生老師講到人體內臟的功能，老師拿了許多儀

器，用手操作，心臟便作有規律的跳動，肺部也隨呼吸脹縮，同學們看得很感興趣。維屏忽然想到一件事，隨即舉手發問說：「適才在實驗過程中，老師以自己的操作為原動力，請問：人體內臟的功能，是那兒來的原動力呢？老師連聲稱讚這問題問得好，老師說：『這是靠著一種看不見的生命的力量。人們進飲食，便可維持這生命力，在宗教方面當然還有解釋，這一點稍後你們會慢慢明瞭的。』」

維屏接著又問：「既然有生命力來推動，那麼像心臟、肺，祇不過是血液循環和呼吸的工具，就好像一個機器上的一小部分，那麼，萬一發生故障，應該可以修理，也可以換一個來替代的了。」老師又連聲誇獎，接著說：「這個問題問得好，問得好。理論上說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不過現在科學的進步還沒有到達那種境地。」

維屏畢業後升入金陵大學，主修數理，為物理學大師戴運軌教授所稱許嘉勉，一九二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憤於日軍侵華，國難嚴重，慨然與救亡圖存之壯志，乃改修政治，聯絡志同道合之有志青年，從事抗日宣傳、捐款救國等愛國活動。被推選為「金陵大學學生會會長」，隨即被推舉為「南京市學生聯合會」主席。一九三三年，華東、中央、金陵、復旦等八大學舉行國語英語演講辯論比賽，維屏與其他兩同學代表金陵大學參加英語辯論，金大榮獲冠軍。大學畢

業後，赴美留學，入伊利諾大學研習政治，一年後獲碩士學位，再兩年，獲政治學博士。

留美期間，蘆溝橋事變中日大戰爆發，維屏凜於民族大義，與紐約地區留學生聯絡加拿大中國同學組織「北美洲中國學生會」，在美加各城市及大學校園宣傳日本侵華破壞和平，激勵僑胞愛國捐獻，受到留學生愛重，當選「北美洲中國學生會」常務理事，負責出版英文月刊「遠東雜誌」(THE FAR EASTERN MAGAZINE)宣導抗日。維屏主持編務期間，撰文評析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公約，威脅世界和平。揭發在華日軍姦淫擄掠之暴行，呼籲民主國家主持正義，遏阻侵略，深獲國際正義人士之同情。

一九三八年八月，維屏自美學成返國，次年春應聘為前中央政校大學部(今國立政治大學)教授，一年後轉任財政部貿易委員會科長。一九四三年改入外交部任美洲司專員。公餘為南京「時事新報」撰寫社論，評議時政，精闢中肯。

一九四五年二月，調任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領事，不數月，奉派代理總領事職務，前後達四年之久。在任期間輔導僑胞成立皮革聯營公司，解決僑廠工潮，深受僑胞愛戴。一九四九年四月調任駐棉蘭領事館領事，轄區僑胞逾五十萬人。時印尼即將獨立，民族思潮澎湃，時有排華事件發生。維屏積極勸導僑胞投資生產事業，創造就業機會，與

當地社會打成一片，以消弭印尼人民排華情緒。同時積極走訪僑社，團結僑胞，支持政府。一九五〇年四月印尼政府承認中共，我駐棉蘭領事館被迫關閉，領館人員均行遣散。他不得已暫留印尼經營農商，於一九五五年返台，任外交部專門委員兼條約司幫辦，處理聯合國及國際組織事務。

一九五四年底，由台返回印尼：準備結束業務，攜眷返國。忽於此時，一家印尼文日報首頁刊登消息一段，大字標題：「關於國民黨地下領事蔡○○」，內容倒沒有攻擊性，祇指出何以中印已無邦交，他還可以居留在棉蘭，儼然是繼續在擔任領事的氣派。當時他猜想這祇是開始，以後還有文章。於是他不得不加速摒當行裝，及早離開。

維屏每次旅行，對自己的行李，一向很細心地檢查，看看有沒有不合規定的物品，以免臨時遭海關留難。即令是持用外交護照時亦然，因為當地政府對外交官的行李免驗是一種禮遇，而外交官本人則和老百姓一樣是要守法的。他從重慶到印度，祇有皮箱一口，很簡單。從印度調到印尼，五口之家，有八件行李。自印尼返國，因係乘船，而子女也都長大，一共有廿六件行李。他照例在沒有加鎖之前，把每件行李內的衣物，仔細看過，然後一一登記在清單上。這次離開印尼時，亦復如此。

後來，維屏在身上取出皮夾，猛然間發現裡面有旅行支票一小冊，美金二千元，這

是他離開印度前在加爾各答銀行換購的，後來一直沒有用。

印尼是實施外匯管制的，固然這旅行支票是決無問題的，但印尼海關職員，是否了解這些，卻不敢說。他就想早點把這個問題解決，臨時時才不致有所顧慮。

維屏請了一位好友來，此人是做大生意的，平時來往新加坡，每月數次。這位朋友到了他家後，聽說是爲了這二千元旅行支票而煩心，笑得連口都合不攏來，告訴他說：「別怕，你交給我好了，那天，我來送行，等你登輪後，我送你到客艙來！」他說：「不行，我的目的是要求個『心安』，因爲那天上船時，可能有一兩百人來送行，如果爲這事使我心中牽掛，我會無心和朋友道別的。」

朋友看維屏如此固執，便說：「好，爲了使你安心，我照你意思做，其實，這是多餘的。」結果，朋友在第二天便把他的旅行支票託人帶到了新加坡。

到了成行之日，先由同事們把廿六件行李送往碼頭。說定辦完手續後，約四時左右，回來接維屏全家去登輪。結果，到了午後五時，才看他們很狼狽地回來，汗衫盡濕，滿面灰塵，手上都貼了膠布，好似大打出手一場，敗陣而歸的樣子。據告：當日海關人員態度大變，廿六箱行李件件打開，翻箱倒籠，好像是在尋找寶貝一般。他們回來時行李還沒有過關，海關當局要等蔡維屏全家去

了以後再說。他們都怕要發生事端，海關顯然是想找麻煩。

維屏安慰了同事友好們，要他們梳洗一番，然後一道兒去碼頭。維屏到時，僑胞二百多人，都在表示憤憤不平。海關人員表面上請蔡維屏全家去接待室，事實上是關在兩間檢查室，作全身檢查，連皮鞋都取下受檢。前後一個小時，海關人員失望地放他出來，接著有安全單位主管到來，印尼軍警都向他敬禮，這位主管劈頭便問海關負責人：「東西搜到了沒有？」架子挺大，神氣十足。海關負責人答話：「什麼都沒有。」安全單位人員說：「再搜？」就這樣，他全家又送進檢查室，結果還是一無所獲。這時，僑領們看到一再檢查而又一無所獲，便理直氣壯起來，大聲抗議，一唱百和，頓時空氣緊張，同僑大有動武之勢。後來，幾位僑領走出來，一面壓制住僑眾，一面當眾向海關人員質詢：何以如此無理。

那位原先很神氣的安全主管，走了出來，先向維屏和他的家人敬禮，然後和僑領握手，宣佈說，此次係接獲傾左的華僑聯合會密報，說蔡維屏這次離境，「隨身攜帶美金十萬元現款，意圖走私。華僑聯合會並且以現金五萬盾爲保證，如果查不出美鈔，願將五萬盾充公，現在既然已知對方誣告，一定要把他們拿辦，同時向領事和在場的僑胞們道歉。」

正當此時，蔡維屏一行所要搭乘的荷蘭

船長和四五位職員，著整齊的制服，走下浮梯，向蔡維屏道賀，並表歡迎。船長說他看到蔡維屏所受的虛驚，表示同情，看他的行李雖經一再檢查，全都放行，爲他高興。在甲板上已預備好了香檳，替蔡維屏慶祝，所有來送行的人，也都歡迎參加。

維屏表示了謝意，也邀請大家一同登輪，氣氛爲之一變。在酒會中，僑領們表示這次領事受辱，大家不能爲助，很是遺憾，但是對方找不到任何可以用爲藉口的物品，就是我們的光榮，今後要大家齊心，誓雪此恨。

過了十多年，蘇卡諾倒台，蘇哈托總統執政，棉蘭華僑聯合會的一夥，幾乎全部都鐐鑼入獄，受了虐待，然而並不是爲了這次告洋狀而被捕。

酒會將結束時，維屏那位做大買賣的朋友上船來，狀甚狼狽，好像鬥敗的公雞一樣。他說，他平日進出海關，登輪送客，猶如走大路一般，可是這次，不僅被擋駕，而且遭搜身，實在不能了解。維屏隨即把已發生的事，詳細告訴了他的朋友。朋友於是長嘆一聲說：「這次要不是你有先見之明，那就糟了。因爲即令是二千元美金旅行支票，他們照樣可以指你違法，加以沒收，而中共報紙也可以造謠說是十萬八萬的走私！」

依照這次的經驗，維屏愈信：在亂世，凡事要作最壞的打算，做最安全的安排！

一九五七年底，蔡維屏調任駐火奴魯

魯總領事，聯絡檀島州市及太平洋美軍總部政軍首長，敦睦邦誼，服務僑胞，成立中國文化基金會，推動中美文化交流。火奴魯魯總領事館館舍年久陳舊不堪使用，經呈准外交部以出售舊館之款，建造新館及職員宿舍。新館落成，融和中西建築特色，具中式牌樓林園之勝，及西式光明整潔之美。獲選為夏威夷州一九六一至七〇年代最佳建築第三獎，亦為外交部駐外使領館中第一個興建職員宿舍的官員。

一九六一年十月奉調回國，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長，主持與美方商訂「在華美軍地位協定」，歷三年又半，並經他親赴美國國務院及國防部交涉，終於達成協議，由兩國政府正式簽訂協定，使在華美軍在我國犯罪者納入我國司法管轄。

一九六六年五月，奉派為駐紐西蘭特命全權大使，促進中紐友好關係，維護僑胞權益，績效卓著。越二年升調外交部常務次長。奉命籌建外交部大樓，悉心規劃，督飭構工，歷十三個月，一座雄偉壯觀、寬敞實用之外交大樓終告竣工。他擔任常務次長七年，添建檔庫、宿舍、興建電台，卓著勞績。

一九七五年七月，轉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中外學者發表論說，爭取國際同情，對大陸及外交政策研提建議，為政府之智庫。一九七九年三月轉任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越兩年，奉派為中國駐美國代表處代表。在任

期間，致力提升中美關係，廣結友好，維護國家利益。一九八二年底，調任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特命全權大使，在任四年，一九八六年八月退休返國，膺聘總統府國策顧問及外交部顧問。

維屏廉能方正，思慮慎密，對人忠誠，寬厚有節，同事推崇，部屬愛戴，與夫人夏叔純女士情感尤篤。蔡夫人一九八六年九月病逝，伉儷情深，維屏悲慟難抑，身心健康，深受打擊。

一九九七年元月初，維屏微感不適，經送醫診治，發現肺部有腫瘤現象，病情已屬末期，無法醫治，於一九九七年元月廿五日逝世，年八十七歲。子蔡樂彬、蔡佳平、女蔡禮如、蔡榮如、蔡倩如，服務社會，均有成就，受到世人敬重。（沈贊夏撰）

戴笠（一八九七—一九四六）

戴笠原名戴徵蘭，諱名戴春風，字雨農，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生於浙江省江山縣的保安鄉。四歲喪父，靠寡母撫育成。戴母教子有方，慈而嚴格。戴笠童年時活動力甚強，行為常有放縱，其母必嚴管勤教。長大後，他曾自稱：「受十年嚴格母教，數百次苦痛笞楚，方苦鍊成今日之我。」由於母教甚嚴，養成戴笠的至情至性。平日，他事母至孝，離開家鄉後，每半月或十餘日必寫信寄母，報告生活

工作概況。身邊如有人回江山，必選母親喜愛的物品帶回，以表孝思。

戴笠長得濃眉大眼，氣度休容，深具組織及領導才能，故能成大功立大業。戴笠六歲啟蒙，讀私塾，誦四書五經，十四歲考進縣立文溪高等小學，在校服務熱心，樂於助人，當選班長，學生會長，以才識卓越見稱。小學畢業後，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就學僅三個月，因勇於認錯，而被開除學籍，隨即以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入浙江聯合師範學校，但他沒有入學，改投浙軍第一師模範營充學兵，隨部參加作戰，不幸戰敗，成了散兵，流落寧波，戴母聞訊，親赴寧波接其回家。一九二〇年再度離家，聲言自我歷練，卻常和幫派份子混處在一起，不過沒有誤入歧途。一九二四年，蘇浙發生戰爭，戴笠在家鄉組織自衛團，自任團長，據守仙霞嶺要衝，阻止閩軍侵浙，使江山縣免遭兵災，博得鄉人讚賞。

一九二五年，戴笠遠走廣州，投考黃埔軍校，經兩次報考，始獲錄取，改名戴笠，字雨農。入校後編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十七連，後來編入騎兵營，在校戴笠是個老生，年屆而立。當時軍校被共產黨徒滲透，共黨氣餒囂張，戴笠深自隱晦，好像無所作為；直到改入騎兵營後，始顯露才華，當選中國國民黨黨部執行委員，並被選為代表，奉派赴奉化晉謁校長蔣中正。陳述扼要有

中正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戴笠即成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重要情報人員。北伐期間，戴笠隻身活動敵前敵後，搜集情報，可直接面呈蔣中正總司令，從而建立起密切關係。一九二九年唐生智在湖南稱兵作亂，戴笠出入唐部駐地，策反兼搜集情報，收穫豐碩，貢獻卓越。駐馬店一役而瓦解唐部，蕩平叛亂。一九三二年一月，蔣中正二次下野後復職，駐錫南京，爲加強情報工作，維護國家利益，乃於二月二十六日正式任命戴笠爲特務處處長，負責佈建國內外情報網。於是此一「殺敵鋤奸，鎮壓反動，安定社會，鞏固抗戰」，爲日本軍閥剋星的特務處，於四月一日正式成立，實際名稱爲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然而追溯戴笠所領導特種工作，應始於一九三一年底成立之密查組。當時全組成員僅十人，組外另有少數通訊員，但戴笠領導能力強，善於組織，工作表現傑出。故而特務處成立，戴笠能在被推薦的六人中，脫穎而出，獨獲拔擢。而後戴笠領導情報組織，除奸弭變，屢建奇功，在短短的十五年內，所建立的赫赫事功，對國家的影響既深且鉅。

蔣中正總統曾言：「革命的成功，全靠特種工作人員能做革命靈魂、國家保姆。」戴笠畢生獻身情報工作，國家近代重要變故，幾乎無役不與，留下輝煌的史蹟和不朽的功業。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叛變將領楊虎城

及張學良以領袖生命作要脅，迫使戴笠赴西安，他們妄圖對戴不利，戴笠聞訊，毅然立即赴難，毫無懼色。西安事變平息後，東北軍調離西安，楊虎城亦一度出國，但由楊某舊部孫蔚如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孫氏表面上服順中央，暗中與共產黨聯繫密切，楊虎城的戴笠對此情況瞭如指掌，後來楊虎城秘密回國，欲重回西安有所圖謀，如果得逞，勢將危及西北大局。戴笠偵知楊虎城行蹤，決定空中攔截，先派幹員控制楊某所乘客機，當飛近湘境，藉口加油，突然降落長沙，戴笠本人也親往長沙等候，楊的座機降落後，即出其不意，將楊虎城截留，改用軍機，由戴笠親自押至南昌，予以軟禁。當時浙滬戰爭進行激烈，情勢極爲險惡，不容再有內部變亂發生，制於未發，自勝一籌。楊某後來死於中共進攻重慶時的亂槍之下。

抗戰前夕，山東省政府主席兼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妄圖乘亂割據一方，暗中勾搭日寇，未放一槍一彈，放棄山東，又強索民捐，攤派煙土，侵吞公款，收繳民槍。一九三八年一月，國民政府軍委會蔣中正主席下令革除韓某本兼各職，並令戴笠捕交軍法總監部，依法嚴懲。但當時韓某手握重兵，處在敵我交錯地帶，如處置不當，可能增加變亂。戴笠奉令後，詳密研究，設計了一套活捉韓復榘計畫。先廣爲宣揚韓某爲國之干城，深獲蔣委員長倚畀，以釋其疑。當韓某

應召參加中原會議，特電韓以沿途不靖，委員長關心韓之安全，囑多帶衛隊，善加防護，使韓復榘洋洋自得。於是率衛隊一團及貼身侍衛數十人，浩浩赴會。專車抵達開封，突發預定的敵機空襲緊急警報，遂致韓與侍衛人員隔離，隻身就逮，經軍法審判，明正典刑。使冥頑將領不敢再心存玩忽，藐視國法，不久即有臺兒莊大捷。於此可見韓案維持國家紀綱，提振士氣之效果。韓死罪只一人，毫無株連，中央派孫桐萱代領其部眾，善予宣導，均相安無事。

孫子兵法載最成功的戰略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如何達成，惟靠策反，可是策反執行不易，要恰到好處，才有奇效，戴笠執行策反，無不馬到成功。一九三六年五月，陳濟棠與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戴笠早有情報，先暗中部署，從海、陸、空三方面進行：海軍方面，聯絡肇和艦和一號四號兩魚雷艇首先起義反正；陸軍方面，余漢謀、李漢魂通電表態服從中央，師長巫劍雄、黃質文通電擁護中央；空軍方面，早先派員聯繫，使其內部動搖，形成瓦解。此時，李宗仁會分別派員赴湖南、上海、寧波、平津等地鼓動學潮，企圖影響兩廣事變，壯大聲勢，均爲戴笠所派在各地工作同志查明，各別破獲，使不能得逞。一九三四年日軍侵占熱河，先製造「察東特別區」，進而組織「內蒙古自治政治」，企圖擴大蒙古軍政府成爲第三滿洲國，戴笠利用策反成效，配合國軍戰力，

一舉收復塞北重鎮百靈廟，粉碎敵人陰謀。一九三八年八月，偽軍將領李福和偕同日軍軍官十餘人，由北平赴彰德偽軍軍部檢閱所謂「皇協軍」（即偽第一軍李福和部），抵達校場時，即為被策反之受檢部隊當場悉數擊斃。此役對敵人心理威脅極大，敵人察覺中國人之民族性不可輕侮，此後日寇對偽軍不再重視，只利用其警備、守護道路橋樑而已。

抗戰開始後，戰火蔓延二十餘省，後方壯丁、糧秣、械彈等補給，必須及時運上前線，而前方傷患難民，又不斷的湧向後方，加之交通不便，肩荷擔挑，步行於途者，彼彼皆是，吸引強悍不法之徒橫行無忌，一四五年三月，政府為維護交通秩序，剪除不法，以利運輸，乃合併原水陸交通統一檢查處，交通警備司令部及部分緝私稅警，設立交通巡察處。隸屬軍事委員會，實際仍為軍統局的一部分。一九三九年冬天，越南河內已被封鎖，我進口物資集中於仰光一地。戴笠赴越視察後，即命在臘戍選擇有掩蔽地方，設立大規模倉庫，將進口待運貨物，迅速轉運臘戍，所以後來敵機轟炸仰光，我方損失減至極度輕微。且運用緬商「孔雀公司」向緬甸交通部請領商用車輛牌照一千份，一般人都不知用意何在！及至翌年英國在日寇壓力下屈服，與敵簽訂封鎖滇緬公路協定，我國在緬運輸的軍公車輛，得以改換前領商用牌照，編隊啓運，直達雲南畹町，將積存

物資源源運回，這種先見之明，非常人所能及。

一九四〇年，抗戰最艱苦階段，大後方的四川糧價突告猛漲，軍糧民食，都受牽動，戴笠運用情報網查出有一個惡勢力集團囤積操縱，大發國難財，首惡為大成銀行董事長楊全宇，楊某曾任成都市長，軍政關係良好，在地方勢力頗大，因之有恃無恐。案發後，他掌握充分證據，立將大量米麥查封，將人犯移送軍法執行總監部漏夜訊辦，楊某被判死刑，旋即槍決，糧價驟跌，供需亦迅速恢復正常。此後數年，後方大城市糧價一直平穩，對抗戰有益，升斗小民亦蒙其澤。

一九四二年二月，商人章德武以大成公司名義，在仰光購置價值三千萬元貨物內運。運輸統制局監察處查悉章某以一百五十萬元賄通中信局運輸處長林世良，假中信局之名代運進口。私貨運抵昆明被扣押後，當時代理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中信局董事長孔祥熙，出面電飭先予放行，戴笠不為所動，迅速檢具罪證，呈請蔣中正主席，發交軍法執行總監部訊辦。以證據確鑿，一鞠即服，林某被判處死刑，貪污之徒為之膽慄。

一九四三年春，陝西緝私處華陰查緝所查扣一批私鹽，價值五百多萬元，案送鹽務局處理。局長于鼎基則認為不是私鹽，批示放行。而查緝所長聞其係依據鹽務條例從隴海路火車上扣留的，當時並無鹽票，確定為私鹽。旋由渭南查緝分所查出華陰所扣私

鹽，係渭南多家鹽商聯合賄送于鼎基三十萬元，乃批准走私運往河南。且查出于某和西安有力軍人勾結私運食鹽，以致釀成西安市之鹽荒。此案經晉陝監察使王陸一查明，提出對於鼎基糾舉書，于某遂被撤職，華陰所扣私鹽充公，西安市鹽荒也隨之解除。

戴笠的另一抱負是建立現代化的中國警察制度，期望刑事警察能運用科學技術偵防犯罪。一九四四年一月，他成立「重慶特警訓練班」，也就是中美合作的第九訓練班，以訓練刑事專才為職志。抗戰勝利後，戴笠又成立中央警官學校特警班，計畫收容北方青年，重建華北地方治安幹部，可惜不久戴笠空難殉身，計畫胎死腹中。

抗戰期間，戴笠傲人的事功，是設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培訓人才，搜集情報，以掌握遠東海域及中國戰區中的日寇動態，以利作戰，此一秘密情報機構，由軍統局與美海軍部分工作人員所組成，由戴笠兼任主任，美海軍梅樂斯將軍專任副主任；工作範圍遍及我國各淪陷地區和南洋各地。由於戴笠秉持中華民族一貫自強自立之精神，以最大之誠意，實踐之作風，親切之關照，對待美方同仁；而梅樂斯將軍也訓誨其部屬克制優越感，鼓勵他們去戰地獲取經驗。在中國從頭學起，因此雙方人員始終合作無間，表現出最高辦事效率和最優工作成果。此「中美合作所」隨戰事於一九四六年結束。軍統局在戴笠領導之下，業務多達十多

種，均係基於客觀環境的需要，由最高當局臨時賦予，並非戴笠個人攬權。軍統局全盛時期，工作人員多達十萬以上，均由戴笠一手組成，淪陷區各地游擊隊及忠義救國軍以及輸誠的偽軍也經由戴笠聯繫，總人數達百萬以上，然而軍統局不同於德國的「黑衫軍」，亦不同於蘇俄的「格別烏」，亦非日寇所形容的所謂「藍衣社」，而是一以行仁爲職志之革命團體，在淪陷區誅倭鋤奸，在大後方除暴安良。戰後整肅漢奸、重振綱紀乃國家一大事，也由戴笠獨任之。且不負所期，善能運用才智，深謀明斷，達成此一重任，所捕元惡大惡數以千計，而民無驚擾，事無株蔓，一切皆以溫和手段行之，公私昭然，中外罕見。其肅奸防諜工作，對於抗戰之勝利，及勝利後，順利接收，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戴笠殉難於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他搭乘航空委員會所派專機由青島起飛，預定於次日趕到重慶，向蔣中正主席報告要公，不料座機在南京板橋鎮附近的岱山因迷霧撞山，戴笠死難，飛機殘骸散落地點名爲「困雨溝」，命也運也，令人難解。戴笠殉身時，還不滿五十歲，正是壯盛之年，死時老母猶在堂，時年七十二歲，戴母於一九四九年春天辭世，彌留之際，猶頻呼愛子之名不絕。其夫人毛氏先他於一九三九年病逝，獨子戴善武，戴笠生前堅不允其帶兵，防其「誤人誤己」，其胞弟戴雲林，能力有

限，慾望甚高，戴氏勤令其回籍奉母，不許在外做事，可見其公私分明，用人唯才。他死後，部屬整理其遺物，僅有舊中山裝數套，無一新製者，可見其清廉。

戴笠殉國，國民政府頒發褒揚令，追贈中將，特准照集團軍總司令陣亡之例公葬，後來又奉准入祀忠烈祠。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公祭，蔣中正以國家元首親臨主祭，並頒「碧血千秋」四字匾額。另晚：「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

續；奇禍從天降，風雲變幻痛予心。」祭文肅穆沉痛，有「悼念時艱，深哀吾黨，惟君之死，不可補償，……」等字句。一九四七年三月，政府公葬戴笠於紫金山麓「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黨國耆宿吳敬恆書「故戴笠中將之墓」墓碑。

大陸陷共後，戴笠之墓曾遭破壞，墓碑已失，但墓地仍在，兩岸開放後，其留台部屬曾往致祭、修葺，目前已像個墓塚了。（何志浩撰）

聖文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